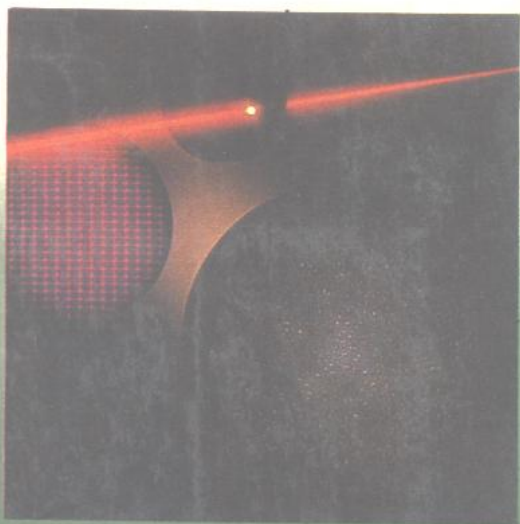


辽宁教育出版社



MEISHU SHENHUA YU JISI

# 美术·神话与 祭祀

〔美〕  
张光直  
著

当代大学书林

当代大学书林

美术·神话与祭祀

张光直 著

张光直 著

张光直 著

史学书系  
MEISHUSHENHUA YU JISI  
美术·神话与祭祀

[美] 张光直

郭净·陈星译  
王海晨校



辽宁教育出版社

## 编辑序语

近年来，出版界丛书热风吹遍大江南北，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一套套丛书接踵而至，这种趋势已成为引人瞩目的当代意识流。《当代大学书林》，也是在这块文化温床上破土而出，并将以自己的特色，跻身于丛书之林。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异常迅速，现代通讯设备已将信息的传播推向崭新的阶段。由此，地球变得狭小了。如果说在古代，闭关锁国还可以生存，那么在今天，一个国家如果断绝同外界的一切联系，那将成为神话了。

我国的封建时代，曾有几个王朝对外开放，使中华民族的文明传向世界，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伟大的贡献。本世纪初，五四运动的先哲们，打破了近百年的沉痾，把西方的先进思想引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建立了面貌一新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人民掌握了先进的世界观和优越的社会制度，我们本可以发扬五四精神，保持同世界的联系，以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去赢得世界。非常遗憾，“左”的错误和各种历史因素使我们自己关上了门。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打开国门之后，世界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五光十色的图景。在改革、开放的十

## 2 美术、神话与祭祀

年来，我们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在这样令人鼓舞的背景下，以传播新思想、积累科学文化成果为己任的我国出版界，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今天，我们有更加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有悠久的历史历史传统，有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有十年的卓有成效的实践，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的、富有生命力的新的文化体系的时候来到了！

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们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都与其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其中，高等教育的规模、水平、面貌，常常反映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科学文化的发展轨迹。

作为一个地方教育出版社，我们首先要为基础教育和普及教育服务。同时，我们愿意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奉献一点绵薄之力。正是出于这种职业责任心，我们确定了《当代大学书林》的出版计划。

《当代大学书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百花齐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方针，有选择地介绍当代中外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新知识、新学科、新观点、新信息，力图在介绍世界文化发展新趋势的基础上，通过比较、鉴别，融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继而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体

系。我们愿意为此而竭诚努力。

《当代大学书林》，要把那些卓有见地、敢于创新的思想文化研究成果纳入“书林”之中，并真诚地推荐给高等院校广大师生，以期在大学的“选修课”、“专题课”、“系列讲座”的教学中留下“书林”的踪迹，这将是我們极感欣慰的憧憬。

《当代大学书林》，是一套综合性丛书，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美学、法学、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化史、宗教哲学、科学哲学、艺术规律研究等广泛领域。以大专学生、研究生、广大自學青年为主要对象，同时也面向广大社会读者。

《当代大学书林》，以学术研究著作作为主体，也适当选入部分译著。对于西方文化的各种思潮、各种流派、各种观点，我们的态度是：有益的，借鉴；有害的，批判。五光十色的世界，并不都是金子在闪光，西方文化中的糟粕是我们要坚决剔除的。所谓“西方文化热”，不过是历史的暂时现象，我们感兴趣的是，要以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神，不懈的努力，重建东方文明，振兴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当今时代，无愧于我们的祖先。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必将同步前进。《当代大学书林》愿作教育大军中的一个士卒，贡献我们应尽的力量。

不树桃李树书林，辛勤耕耘也成荫。愿我们的作者、编辑和广大读者互相支持、通力合作。同时，热切盼望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正。

## 译者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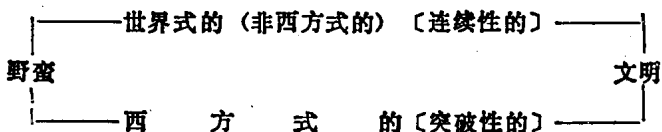
古往今来，中国文明在整个世界文明的体系中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它的价值何在？它的特征是什么？这些都是置身于当今变化的文化环境中的人们所不能不思考的问题。本书的作者张光直先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为我们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这个角度就是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寻。本书的论述对象——夏、商、周三代，恰是中国这块土地上最早诞生的文明。张先生认为，就世界范围来看，文明的产生，即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为契机，通过技术的突破，通过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的质变；另一种则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它在技术上并没有大的突破，而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威的建立与维持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前者以古代两河流域的苏末(Sumerian, 又译为苏美尔)文明为代表，其特征是金属工具在生产和灌溉中的大规模运用，贸易的扩展，文字对经济的促进，神权与国家分立等等。它成为近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来源。后者则以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为代表，其特征为金属在政治与宗教活动中的广泛运用，政治分

## 2 美术、神话与祭祀

层系统与网状结构的形成，文字和艺术成为宗教的附属品，成为无人沟通的工具。如果说前者在兴起的时候突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束缚，并与旧时代之间产生了断裂；后者则从史前继承了各种制度、观点与仪式。

这两种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方式可以用一个图式来说明（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17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张先生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中国——玛雅文明曾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世界式”的；而苏末文明在其产生的时候只是一种例外。这个观点，无疑是对中外传统历史观的严重挑战。其含义非常明显：随着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全球性扩张，它所孕育的各种思想便成了说明所有历史现象的唯一准则（详见本书第7章），这些基于人类一部分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不可能适用于人类文化的一切方面，也不可能解释人类文明的全部进程。因此，现在是从总结普遍规律的立场出发来研究中国文明史的时候了。“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以清楚、有力地揭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新的法则。这种法则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变化法则”（《考古学六讲》24页）。显然，这也是对传统的形式主义二分法和“全盘西化论”的一个挑战。人类的文明只能用人类历史的全部事实加以说

明，中国历史也将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这部著作中，张先生利用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神话学的各种材料，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特征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其关键是政治权威的兴起与发展。而政治权力的取得，主要依靠道德、宗教、垄断稀有资源等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天地人神沟通手段的独占。古代中国文明有一个重要观念：把世界分为截然分离的两个层次，如天和地，人与神，生者与死者。上天和祖先是知识和权力的源泉。天地之间的沟通，必须以特定的人物和工具为中介，这就是巫师与巫术。统治者只要掌握了这二者，以及附属于他们的艺术、文字等物事，就占有了与上天和祖先的交通，也就取得了政治的权威。可见，三代的统治带有强烈的巫术色彩，这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即“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shamanistic, 即巫覡式的——译者)的文明’。这是一个极为新颖的启示。巫覡文化不仅笼罩了三代，甚至在以后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从上层统治者的封禅求仙，到普通老百姓的算命打卦；从秦末陈胜吴广的荒郊狐鸣，到清代蒲田人民的设醮祈雨，莫不有它的影子。巫术文化在中国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确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课题。

作者研究问题的方法，也是我们深感兴趣的一个重要方面。张先生的本行是考古，他早年就学于台湾，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以后又在美国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历聘为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主任，皮巴蒂东亚



#### 4 美术、神话与祭祀

考古博物馆馆长，对宾弗 (Lewis Binford) 的“新考古学”理论、韦伯 (Max. Weber) 的社会政治观点、马林诺夫斯基 (B. Malinowski) 和李奇 (E. Leach) 等人的婚姻理论以及列维-斯特劳斯 (Lévi-Strauss) 的“二分现象”分析都非常熟悉，能自如地加以评价，并创造性地运用于研究之中。对中西文化的深刻了解与把握，是近代以来有所作为的学者普遍具备的基本素质。他们“兼通中西，在研究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兼及欧美学术思想发展的新方向，又能因为‘中学’的根底，而对一般性的问题提出新的有批判性的看法，从而对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前途上，提出创新的见解。”（郑培凯，《大洋彼岸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书院学报》1984年4期）。兼通中西，正是国内青年学子所努力的方向，也是中国文化研究持续、深入发展的基础。

欲全面了解张先生理论的读者，可将本书同他的另外两部著作结合起来阅读：一部是《考古学专题六讲》，书中对两种文明的发生方式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特征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另一部是《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这是张先生1961—1981年所写论文的汇编，对三代文明的各个方面作了详尽的专题论述。

由于笔者学识有限，译文中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见谅。

郭 净

1987年8月3日于昆明

## 《中译本》作者前记

《美术、神话与祭祀》这本小书是在我历年“出土”的拙著中我自己比较最为喜爱的一本。所以喜爱它并不是因为觉得它写得最好、最为成熟，而正是因为它是最为不成熟，也就是最为年青的一本。它是从我在数年前为了大学本科生（多是对中国文明或对考古对古史不熟悉的）所设计的一门新课的讲稿中选出来的。它的对象是一般的读者（听众）而不是专业的学者，所以写起来比较令我兴奋，比较使我少受专业传统的束缚，也可以算是对中国古史研究的一种方式的一次试验。多年来我一直主张中国的古史研究不属于狭窄的专业，而应当是由各行各业的专家——包括史学家、考古学家、美术史家、古文字学家、古地理学家、理论家、等等——携手一起从各方面、各角度，利用各种的资料来从事进行的。这本小书是我在这个方面所作的试验中比较最彻底的一次，同时很自然地也就是最不成熟的一次。因为它不成熟，它更有进一度大幅成长、开花、结实的机会，也就像人在青年，如果努力修习，更可前途无量。不用说，要它有进一步的发展，它更需要读者的批评与建议。

## 2 美术、神话与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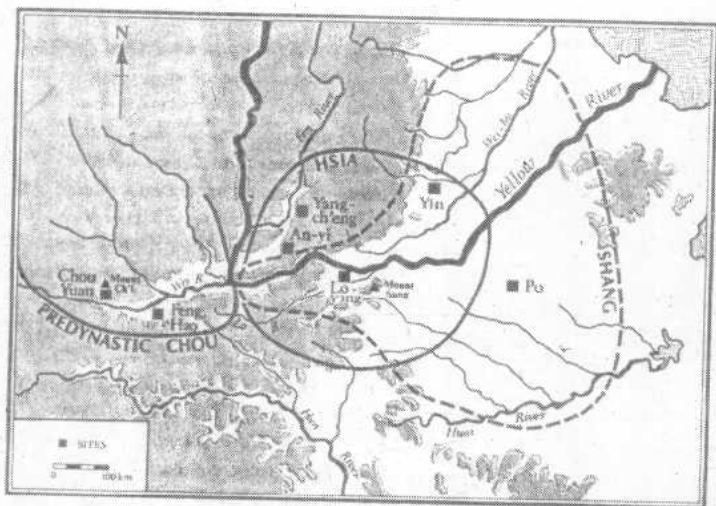
---

这书如今能与广大的中国读者以中文译本的形式见面，是使我非常高兴的事，因为中国读者的批评与建议更是我所渴望的。

这本书在结尾时，强调主张中国古史对社会科学一般理论上应当有积极的贡献，但在书中并没有畅言应有什么具体的贡献。后来我在《九州》学刊上登载了一篇短文叫《连续与破裂》，在这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尝试。很感谢译者和出版社同意把这篇小文附在中译本的后面作为它的《后记》。

张 光 直

1988年1月在美国哈佛大学



古代中国地图：标明了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大致分布区。  
 PREDYNASTIC CHOU, 周人立国以前； HSIA, 夏；  
 SHANG, 商； Chou Yuan, 周原， Feng, Hao, 丰、镐，  
 An-yi, 安邑， Yang-cheng, 阳城， Lo-yang, 洛阳， Yin,  
 殷， Po, 亳， Mount ch'i, 岐山， Mount Sung, 嵩山，  
 wei R: 渭河， Lo R: 洛河， Fen River: 汾河， wei-ho  
 River: 卫河， Youow River: 黄河， Han River: 汉水。  
 SITES: 都城位置； km: 公里； N: 北。 Huai River: 淮河。

## 序 言

古代中国的艺术与神话同政治有着不解之缘。我们总是习惯于把政治看作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决定因素，然而，认识到它对古代中国也具有同样重要性的人却并不多。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将得之于考古学的，以及文学和艺术的材料与观点结合起来，对此作一番论证。

因而，本书具有双重的目的：其一，提供一个基本的视界，从性质与结构两个方面对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古代中国文明进行观察；其二，力求证明：如果我们能超出传统的专业局限，这对于古代文明，至少对古代中国文明的研究会大有裨益。这个观点正是我十年来所反复强调的<sup>①</sup>。

“古代中国”一词，包括了公元前2000年中的主要阶段。在夏、商、周三个王朝统治期间，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历史文明<sup>②</sup>。按照传统纪年表，夏朝的年代为公元前2205～前1766年，商代为公元前1766～前1122年，周代为前1122～前256<sup>③</sup>年。除最后一个数字以外，其余的年代均有问题。专家们为此聚讼纷纭，仅周朝的起始日期便有不下十八种说法<sup>④</sup>。这些技术性争论是非难断，就本书的宗旨而言并不重要，因而我们采用整数来标定三个王

## 2 美术、神话与祭祀

朝的年代：夏朝为公元前2200～前1750年；商朝为公元前1750～前1100年；周朝为公元前1100～前256年。

夏之前的时代，即中国的史前史，可根据两种资料予以重建。第一种是三代文献（其实大部分为周代后期所撰）中涉及公元前2200年以前的神话传说，其中多为古代英雄圣贤的事迹。这些传说至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才经整理而构成三皇五帝的体系（见图1）关于三皇五帝，其说不一。按照最流行的观点，三皇为伏羲（天下第一个男子），燧人（一说祝融，发明用火之人），神农（发明农耕之人）。五帝则通常为黄帝（文明创造之人），颛顼（以双手分天地之人），帝喾，尧、舜<sup>⑤</sup>。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这些英雄圣贤一直被当作真实的历史人物。近几十年，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才宣称：他们即使不都是，至少大多数是古代宗教里的人物，却在周代后期和汉代被人们“历史化”了<sup>⑥</sup>。

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第二类资料来自考古学。20世纪初，科学发掘古代人类与文化遗迹的考古学由西方和日本传入中国<sup>⑦</sup>。人们通过考古发掘，不断揭示着史前文化的面貌：它肇始于约二百万年前人类早期祖先的出现；随着它的行进，约四十万年前诞生了著名的北京猿人；约一万年出现了畜牧与农耕，以及农业村社的成长，直到三代文明的前夜<sup>⑧</sup>。有些晚期史前文化，或许为某些神话英雄所创造；但史前的人们，却并未留下可资后代认识其英雄的文献资料。

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既有文献可征，又有遗迹可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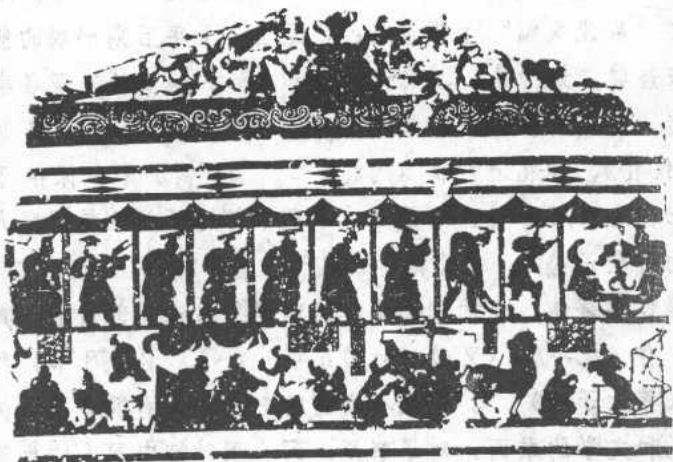


图1：山东嘉祥武梁祠（二世纪中叶）汉画像石中的中国古代传说人物（三皇五帝）。中间一行是传说中的英雄和圣人，以及夏朝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君王。从右到左：人类祖先伏羲和女娲，他们的两尾相缠；祝融，火的发明者；神农，农耕的发明者，手持木耒，黄帝，文明创始者；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大禹，夏朝建立者；最后一位是夏朝末代君王桀。

#### 4 美术、神话与祭祀

第一时期。当然对夏代而言这并不准确，我们至今未找到夏人留下的片言只字。但商、周两代却有文字记载为依凭<sup>⑩</sup>。然而，许多与三代有关的后代文献，其实已为商、周的材料所印证。因此，有关夏代的记载，较之有关史前（夏代以前）的任何材料大概都更为可靠。此类“后代文献”主要包括：公元前一千年后期形成的儒家经典，如《易》、《诗》、《书》、《春秋》及各家传，主要是左丘明的《左传》。还有《三礼》，包括《仪礼》、《礼记》和《周礼》<sup>⑪</sup>。《楚辞》中也保存了三代的有用资料，它是周末中国中部地区几位楚国骚人的诗歌汇编<sup>⑫</sup>。有关材料也见于《论语》<sup>⑬</sup>、《孟子》<sup>⑭</sup>等哲学著作。公元280年，河南汲县出土几部竹书，其中有《纪年》（又称《竹书纪年》）<sup>⑮</sup>，《佚周书》和《穆天子传》。其中既有丰富的史料，又有很多神话传说和文学的东西，对了解夏、商、周时期中国人的生活颇有价值。

近年出土的秦汉简牍帛书，为三代有关文献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这些资料多记录在三代以后的竹木简册和纸帛书上，后者因埋藏二千年，已趋腐坏）（见图2）<sup>⑯</sup>。古代器物 and 铭文等新材料也已披露于世。除了对考察青铜时代生活面貌必不可少的石、陶、木、竹器物及丝绢和青铜器之外，考古学又为我们提供了其他文字材料，主要是商代和周初的甲骨卜辞（见图3）<sup>⑰</sup>和青铜礼器铭文<sup>⑱</sup>。

本书以上述所有形式的史料为依据，对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并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寻求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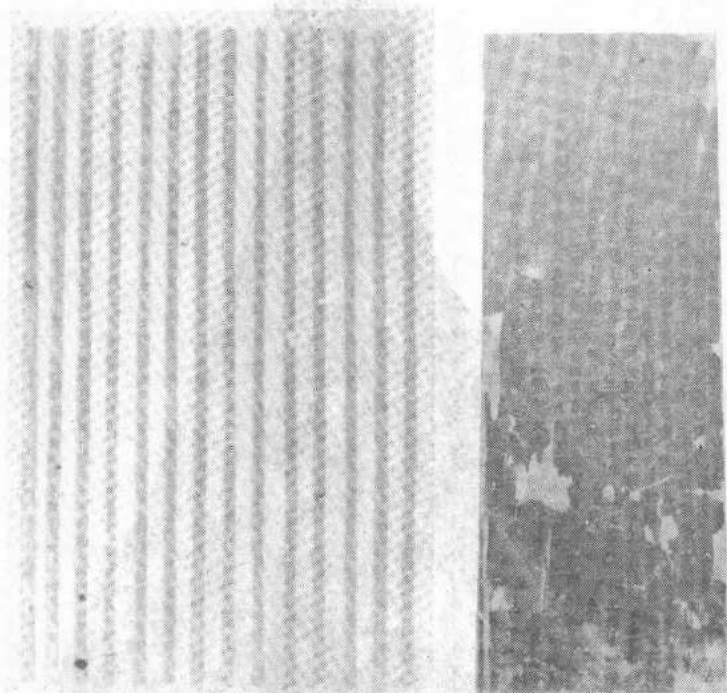


图 2：近年发现的秦代简牍（左）和汉代帛书（右）。左边的残简长约28公分；右边的帛片长约18公分。